

见证历史

张树军◎主编 唐筱菊卜伟华 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

1975—1976

这是一个整顿之年，经过十年「文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濒临崩溃的边缘，周恩来又病重，毛泽东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议重新起用邓小平，对全国各行各业进行全面整顿。

虽然有「四人帮」的极力干扰，邓小平还是迈开了整顿的步伐，尤其是对关系全国经济命脉的铁路进行了大整顿，扭转了局势，全国面貌为之一振。



见证历史

中国

1975—1976

张树军◎主编

唐筱菊卜伟华 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见证历史：中国 1975—1976 / 张树军主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1

ISBN 978 - 7 - 5438 - 5535 - 9

I. 见… II. 张… III. 历史事件 - 中国 - 1975—1976

IV. K270.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9150 号

见证历史 中国 1975—1976

主 编：张树军

出 版 人：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莫金莲 黎晓慧 洪江水

装 帧 设 计：虢 剑

出版、发行：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http://www.hnppp.com>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410005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 1092 1 / 16

印 张：31

字 数：631000

印 数：1 - 10000

书 号：ISBN 978 - 7 - 5438 - 5535 - 9

定 价：48.00 元

惊心动魄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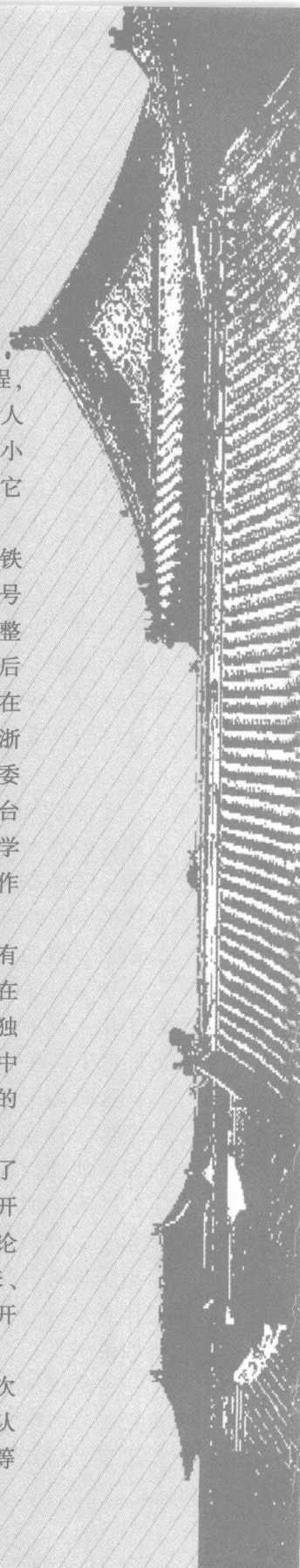
时间跨入 1975 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已走过十年历程，形势一片混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鉴于他们病重，提议重新起用邓小平。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它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也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试验。

整顿铁路运输是全面整顿的起点。由邓小平点将的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强调铁路部门要把党中央关于整顿铁路的 9 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铁路整顿很快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整个铁路大动脉开始“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随后钢铁工业、军队、军工、教育、文艺、科技等领域的整顿也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谭启龙（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革委主任）、铁瑛（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的亲身经历向人们展示了与“文化大革命”唱对台戏，抓全面整顿批派性斗争的艰难历程。刘华清关于中国科学院的整顿的回忆再现了邓小平力挽狂澜全面整顿全国科技工作领导机构，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科技政策的风采。

为配合全面整顿工作的宣传，1975 年 6 月，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正式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 1975 年整顿中，作为邓小平的写作班子和参谋班子，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于光远（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在回忆中讲述了这个机构成立的经过、几个负责人的分工，以及所做的主要工作。

正是 1975 年的整顿唤醒了全国人民空前的觉醒，加速了“四人帮”走向灭亡的过程。但正当邓小平聚精会神地重新开展全面整顿工作并见到成效时，“四人帮”借毛泽东同意评论古典小说《水浒》之机，含沙射影地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并逐步将这场斗争公开化。这样，正义与邪恶的公开较量势在必然。

1975 年 8 月和 10 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毛泽东武断地认为，刘冰等人的信矛头是对着他的，还以邓小平转交了刘冰等



人的信为由，批评邓小平偏袒刘冰。刘冰等人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打成“正在走的走资派”、“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刘冰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两次上书毛泽东的经过以及自己对此事的认识。

吴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的回忆讲述了关于批判“经验主义”等问题上同“四人帮”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后期在解放干部问题上的一场斗争，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

郭吉成（时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警卫值班室副主任）回忆了江青在1975年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的一些丑恶表现。

就在“四人帮”猖獗之时，令人心痛而又令人欣喜的1976年来到了中华大地。

197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7周年，这两个数字，对于一个人来说，恰好正处于其壮年和青年的关键点。而对于我们的党和国家来说，又何尝不是正处于其发展的关键点呢！然而，这一年，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却要承载其前所未有的巨大悲恸，也是在这一年，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终于迎来期盼已久的巨大喜悦。

这是中国历史上令人心痛的一年。我们这一辈人是听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伟人的名字长大的。但在这一年，我们却相继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那时我们还年幼，对国事、党事尚懵懂不知；那时，只记得一年之中人们臂上的黑纱刚刚摘下，又戴上，再摘下，又复戴上；人们胸前的白花刚刚取下，又别上，再取下，又复别上。那时，据说北京市的黑布和白纸都卖光了。赵炜（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几十年）、朱和平（朱德的孙子）、周福明（毛泽东的理发员）在各自的回忆中，深情记录了三位伟人生命中的最后日子，读后令人不禁潸然泪下。

这是人民觉醒的一年。这一年，从3月底开始，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各界群众，不顾“四人帮”的阻挠，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读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寄托着对周总理的无限哀思，对“四人帮”的无比愤怒，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万分忧虑。清明节，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吴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在回忆中记述了亲历“天安门事件”的处理过程，纠正了社会上一度流传的一些不正确的说法。

这是祸从天降的一年。这一年，我们的国家遭遇了“20世纪全球十大灾难之一”的唐山大地震。这一巨祸奇劫造成了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一座重工业城市瞬间毁于一旦。但“唐山无泪”。当大难和悲剧突如其来降临

时，唐山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把巨大的悲痛压在心底，在全国人民特别是人民子弟兵的支援和帮助下，以顽强的生命力自助自救，与灾害抗争。唐禹民（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摄影干事）、张广友（新华社记者）都在地震当天赶赴现场，他们从不同角度记述了惨不忍睹的灾情，以及当灾难猝至时中华民族所表现的万众一心、共赴危难的感人情景。

这又是人们再获解放而欣喜若狂的一年。这一年的金秋十月，在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经过这场大搏斗，中国历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中国人民避免了一场大灾难。除掉“四害”，人民大解放，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解放。祖国大地，前程无比灿烂。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作为当时参与组织实施抓捕“四人帮”具体工作的见证人之一，在回忆中如实记述了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读后令人惊心动魄。

这两年，要记述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仅仅从亲历者的角度，撷取其中比较重要的回忆，结集成册。当然，记忆难免有误，因此，我们采取旁注形式对明显不准确的地方给予注解，同时，为了使人们能更深入地了解在这一年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有关背景，我们又以相关链接作为补充。希望通过这些亲历者的回忆，能给予人们尤其是当代青年以一定的思考。

时光转瞬即逝，但历史却不能忘记。1975—1976年所发生的那些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所涌现的那些可圈可点的重要人物，仿佛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注定要永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目录

中国
1975—1976

全面整顿

抓整顿、批派性 谭启龙	002
整顿科学院 刘华清	011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于光远	023
江青与农业学大寨会议 邬吉成	028

总理逝世

马克思的“请柬”我已经收到了 张佐良	036
周恩来忍辱负重最后岁月 童小鹏	052
西花厅送别周总理 赵 炜	073
历史的见证：周总理逝世“四人帮”竭力压制	
治丧宣传 杨正泉	088
周总理的讣告和悼词起草前后 周启才	097

四五运动

插手空军：“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重要步骤 张廷发	106
-------------------------------	-----

南京军区智斗“四人帮” 廖汉生	112
天安门事件的经过 吴 德	124
“四人帮”最后一次反扑 张根生	136
1976年的交通部：多难之年 叶 飞	144

大地怒吼

1975年淮河大水灾亲历记 张广友	162
目睹唐山大地震 唐禹民	182
唐山大地震采访记 张广友	192
撼山易，撼我军民难——“7.28”唐山抗震追忆 迟浩田	203

主席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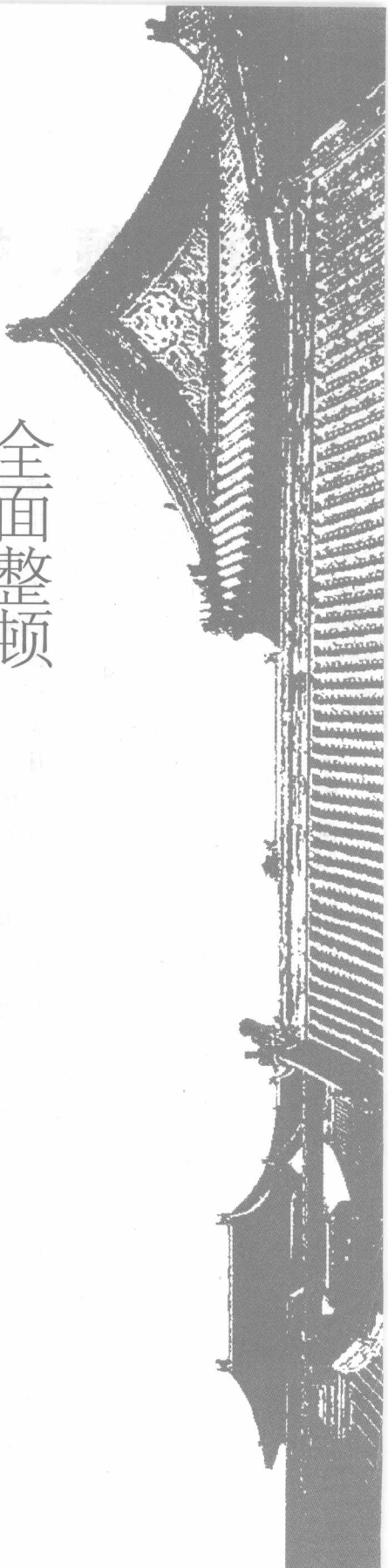
我和主席的最后一次见面 铁 瑛	210
毛泽东最后的日子 周福明	218
毛泽东逝世消息播发前后 杨正泉	224
毛主席的讣告和悼词形成前后 周启才	232

粉碎“四人帮”

“四人帮”最后的疯狂 吴 德	240
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 吴 德	262
粉碎“四人帮”的策划和实施过程 武健华	280
接过华国锋手令之后 耿 飏	310
赴京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 周纯麟	317
中央派出的上海工作组纪实 陈锦华	327

重 要 人 物

毛泽东二见尼克松 熊向晖	356
1976 年的邓小平 毛 毛	372
陪伴爷爷朱德的最后日子 朱和平	388
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日子 陈锡联	403
上书毛主席，离开“四人帮”控制的上海 陈丕显	409
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 刘 冰	428



全面整顿

1975年，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已一片混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毛泽东提议重新起用邓小平。这一年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主持中央工作，对全国各条战线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迅速扭转了党政军各项工作中的困难局面。然而……

抓整顿、批派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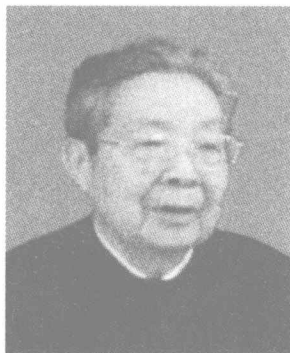
谭启龙

谭启龙：江西永新人，1913年1月生，1961年4月至1967年2月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70年至1972年春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4月至1973年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5年1月29日至2月6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精神，同时贯彻中央〔1975〕2号文件，即针对浙江、云南等省某些人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等问题而作出的决定：“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会上，省委再次要求停止派性活动，撤销民兵指挥部之类组织。对此，张、翁、贺等人仍然极力抵触，煽动温州、台州的造反派向会议施加压力。他们置中央的决定于不顾，在会议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指使洞头县造反派头头王希真、郭顶，带领数百人冲击省委工作会议，冲进正在举行全体会议的杭州饭店小礼堂会场，冲上主席台，在全体与会人员的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对我进行绑架和殴打，还打伤会议工作人员多人，并把我劫持出会场。在强行架持到北山街的一

相 关 链 接

1975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指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但目前，浙江、云南的个别地区、单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两派对立，把民兵组织搞了进去，坏人乘机挑动，分裂民兵，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破坏革命、生产秩序，危害人民生命。



谭启龙

。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实现‘安定’、‘团结’，发展大好形势，中央规定：一、无论什么人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容许的。

二、凡因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联合好的地区和单位，一律不要成立‘民兵指挥部’或‘民兵团’之类的机构，一律不要给民兵发枪。民兵组织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加以整顿，通过整顿民兵促进实现革命大联合。三、凡已发生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的地区和单位，省委应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的武器、弹药，集中封存，妥善保管。”《通知》要求将中共中央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精神，在浙江、云南广泛传达到基层党支部和群众，全国其他地区传达到县、团级单位。

段路上时，幸亏杭州市公安局几位民警、警卫战士以及我身边的秘书和警卫员奋力救护，才把我从造反派手中夺回。当时，我心脏病急剧发作，心动过速，呼吸困难，幸亏身边的工作人员及时给我服药，转移到西泠宾馆4号楼保护起来，才转危为安。事后得悉，在我突遭绑架、会议中断的时候，省政协副主席、我的老战友何克希曾激愤地迈上主席台，当众痛斥公然冲击省委工作会议、绑架省委第一书记的非法行径，并不顾年老体弱，拄着手杖追赶。蒋宝娣（省委常委、候补中央委员）和省委办公室的同志当即在杭州饭店接通中央办公厅值班电话，向中央报告了我被绑架的情况。莫显耀（中央委员）在会场陷于一片混乱，与会人员纷纷撤出会场的时候，站在大门口大声劝阻，告诉大家已向中央报告，大家不要走，回到会场去。当天深夜，中央办公厅奉命打来电话，向省委查询我被绑架后的情况。小平同志得知此事后，也让中办打电话，讲：“谭启龙不能倒！”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从此，我下定决心挺起腰杆和“四人帮”斗到底。第二天，省委工作会议仍在原地举行全体会议，我谢绝了同志们劝我休息一天或半天的建议，仍上主席台出席会议。同日，省委决定拘留王希真、郭顶。张永生秉承王洪文的旨意，竟又大吵大闹，叫嚷要批判我“支一派，压一派”、“翻烧饼”的错误，妄图扭转会议方向。2月6日，我在会议结束时讲话，再次强调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1975〕2号文件精神，坚决按照1月29日省委《关于撤销省委批林批孔小组的通知》，撤销各级“批林批孔小组”及其办公室，所有人员一律回原单位。

（相）（关）（链）（接）

1974年1月7日，杭州市决定学习上海民兵工作的“新鲜经验”，建立杭州市民兵指挥部。为此，贺贤春（造反派头头，浙江省革委会常委）带人去上海“取经”后，与翁森鹤（造反派头头，浙江省革委会常委）提出以“社会治安指挥部”为基础，以“造反派”、“反潮流战士”为主体重建民兵的方针。公然宣布民兵要由民兵指挥部独家经营，军区、军分区、人武部不得过问，要“民兵独立”成为“第二武装”。2月21日，杭州市委决定建立以贺贤春为首

的杭州民兵指挥部。在张永生（造反派头头，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翁森鹤、贺贤春等人谋划和影响下，台州、金华、温州、宁波乃至全省81%的市、县，先后成立民兵指挥部和类似组织。民兵指挥部一建立就连续发动武斗，设立了许多任意关押、酷刑拷打无辜的场所。在温州市民兵指挥部的68处“公堂”，先后关押、拷打3053人，33人被毒打致死。同时，以方剑文（造反派头头，浙江省革委会常委）为首的另一派则在杭州、长兴等地拉起“浙江民兵师”、“民兵独立团”等组织与之对抗。



1954年，毛泽东和谭启龙在浙江绍兴

1974年3月8日，中共浙江省委决定成立批林批孔小组，谭启龙任组长，柴启琨、张永生、华银凤、翁森鹤任副组长，翁森鹤兼办公室主任。此后，各市、地、县，各部门纷纷建立以造反派为主体，凌驾党委之上的批林批孔小组。

从党的十大以后到批林批孔，是我主持浙江省委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心情最不舒畅，思想最苦恼。上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等人以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的名义压我，下有他们操纵支持的张、翁、贺等一帮人不断地批我整我。其目的，无非是实现夺取省委的领导权。在我突遭绑架时，几年来积聚在我心头的怨怼、郁结突然爆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只好直接向党中央、毛主席拍发了请示辞职的电报。

1984年我在四川工作时，小平同志来四川，在成都金牛宾馆与小平同志交谈时又说起这一段历史。我说，在我一生的工作中，心情都是很舒畅的，唯独在浙江工作的这一段，最不舒畅，最苦恼。小平同志说：“那个时候‘四人帮’控制局势，你还能舒畅吗！两派都是错误的。”小平同志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使我听后释然于怀。

◎抓整顿、批派性——短暂的平稳期

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在各行各业抓整顿，批派性，形势开始有了较大的好转。

1975年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集中精力抓各方面的整顿。2月8日，毛主席视察南方到了杭州，我们通过关系，让他亲自了解到浙江存在的一些问题。6月下旬，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决定派王洪文、纪登奎及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等人来浙江，调查研究和协助整顿浙江的问题。浙江已乱到了几乎无法收拾的地步，现在有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亲自过问浙江的问题，我头脑清醒了，感到解决问题、扭转局势有希望了。

毛主席请小平同志出山以及对他的高度评价，对于处心积虑坚决要把他打倒的“四人帮”反党集团来说，不啻是当头棒喝，而广大干部群众莫不欢欣鼓舞。小平同志1月25日关于《军队要整顿》的讲话，3月5日关于《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7月4日关于《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等等，反复强调要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大讲要批判和克服派性，各方面都要进行整顿，才能达到安定团结，把经济搞上去的道理。这些话，在那个两耳只闻批斗声的动乱岁月，像是黑暗中的曙光，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兴高采烈！学习、传达和贯彻小平同志这些讲话精神，就是最好的思想发动，就是最好的动员令。处于派斗不止、工厂停产半停产、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之中的浙江人民，看到了一线希望。

中央派人来帮助省委解决浙江问题，这是大好事，是我们早就求之不得的。但是，那个不断插手把浙江搞得如此之乱的王洪文又来了（这是他第二次作为正式中央派员来浙江），这一次他将会怎样？他肯自己替自己揩屁股认错吗？他会有什么收敛吗？不过当时我有一点感觉：这一次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明确以纪登奎同志为主，王洪文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他把浙江搞得乱上加乱，我满腹的怨愤。纪登奎同志在场，他假惺惺地向我征求意见，我毫不客气地给他提了十条意见。哪十条，现在已记不全了，只记得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江青写信派迟群、谢静宜到二十军防化连“放火烧荒”，点名说“谭启龙是浙江最大的走资派”，为什么事先根本不同我打招呼？为什么省委也不知道？我如有错误，你应当同我们讲嘛！另一条是：你是党中央副主席，我是省委第一书记，有关浙江的事你为什么不同我打电话，反而一次次地给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打电话、发指示，究竟谁是省委第一书记，

是张永生，还是我?! 再一条是：你们既然支持张、翁、贺，为什么中央不直接让他们掌权?! ……他支支吾吾，无法作答。但肯定他记恨在心，待有机会还会置我于死地的。

1975年6月20日至8月4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首先检查了省委领导在关键时刻和一些重大问题上思想不统一，步调不一致的“软、散”问题，具体清理了1974年“三全会”期间的问题，“批林批孔小组”问题和“双突”问题。我代表省委常委作了检查，并作了自我批评。7月13日，省委向中央、毛主席报递了《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7月17日，中央即以中发〔1975〕16号文件向全国转发。中央在批语中指出，“浙江省委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批语中肯定了“浙江省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坚决纠正前一段这方面问题”的做法，同一天，中央还作出了调整和充实浙江省委领导班子的决定。

相关链接

1973年10月中旬，浙江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策动杭州市级机关60余名已回基层的造反派向省委发难。以“落实政策”为名，声称以前“新干部”被省革委会的“复辟文件”打回回营，现在要回来了。省委未予同意。于是，夏根法等人提出由杭州市工代会举办“打扫回营新干部学习班”。得到省委常委王子达、沈策的同意和支持。这些人便成了张、翁反潮流的骨干和突击提干的主要对象。11月16日，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组织300多人的“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冲进花港招待所，围攻省委领导，提出要省委安排住宿、听取意见并接受揭发批判等要求。当天下午，他们全部上了屏



1965年11月，毛泽东在济南西郊专线车站接见山东省和济南军区负责人。前左一为杨得志，左二为谭启龙

风山疗养院，占山为王（后称“山上派”）。同时派人去北京告省委的状。12月上旬，“山上派”在屏风山疗养院连续开了四个半天的批判会，批判省委领导的“错误”。12月中旬，持不同观点的温州、台州等地和一些大专院校的大批人员又拉起“浙江省各地区、大专院校上访团”，统一行动，两派对立进一步尖锐化。12月8日，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以“屏风山学习班”名

义，抛出《关于坚决落实中央指示，把浙江问题解决好的几点建议》一文，提出要省委责成杭州市委先走一步，限期把“反潮流”骨干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今后提干、“纳新”要以“山上派”为基础。12月19日，张永生等人带领屏风山的一伙人大闹省委常委会，要挟省委把“反潮流战士”杨金林请出来，企图以此为突破口，替批林整风中受审查的造反派翻案。20日凌晨，张永生又带领绍兴上访团一伙人到杨金林被隔离处，辱骂殴打警卫人员，威胁、恐吓专案人员。1974年3月11日，杨金林被解除隔离审查后，当即被加封8项职务，并让他带头“揭发控诉”。此后，7个地区有174个类似人物被释放，专案审查人员却遭批斗打击。1973年1月，为与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的上访团（“山上派”）相抗衡，以方剑文、邵素贞、张来根等人为首也先后拉起7个地区“批林批孔汇报团”、“反潮流工人赴京汇报团”等组织，形成“山下派”，以及处于中间的以郭志松为头头的“山腰派”。这些派别都以各自为中心，加剧了对立和混乱。对此，省委常委中多数人强调不能跨行业、地区拉帮结派。也有少数人公开支持“山上派”的反潮流活动，省委内部斗争公开化、尖锐化。3月19日，翁森鹤、贺贤春致信杭州市委，伸手要市委常委等60个官位，限期3天为其安插造反骨干。在此之前，翁森鹤、张永生、贺贤春率先分别在杭丝联、浙江美术学院和杭州市民兵指挥部大搞“双突”（即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典型试点。把杭丝联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几乎彻底换班。并以省批林批孔小组名义，组织3000多个单位，几万人到杭丝联参观，向全省推广“双突典型”。3月31日，张永生在屏风山召开会议说：“我们过去只会冲冲杀杀，没有解决组织问题。现在要发展‘反潮流战士’入党，各级班子中新干部要占多数。”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在王洪文的支持下，列席了省委常委会，接着，他们便向省委伸手要把50个“反潮流战士”安排到省委、省革委会主要办事机构。对此，省、市委先后予以接受。5月上旬，屏风山派山头散伙时，张永生、翁森鹤说，我们这里官帽多得很，你们自己挑选。仅这次就有300多人被突击提拔起来。这样，不到3个月全省竟“双突”1万余人，在此期间，全省发展党员40590名，其中“双突”人数达38005人。上至省委常委，下至厂矿、街道，都有为数不少的“双突”人员执掌大权。尽管如此，他们还在王洪文授意下，搜罗一大批“反潮流战士”，列席各级党委常委会议，使各级党委根本无法开展工作。7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发出增补领导干部暂缓办理的指示。浙江正处于“双突”的高潮，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大肆叫嚷在要权问题上决不避嫌。同时，由于省、市委的迁就乃至个别人的公开支持，全省“双突”仍呈发展趋势。1975年6月20日，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王洪文、纪登奎到会。纪登奎在会议期间3次讲话，严厉批了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等人蛮横阻挠批派性、纠“双突”和抓生产，明确指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警告他们不要走得太远了！会议根据中

央指示精神，检查了省委领导在关键时刻和一些重大问题上思想不统一、步调不一致的“软、散”问题。具体清理了1974年3月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党委全体委员会议问题，“批林批孔小组”和“双突”问题。谭启龙代表省委常委作了自我批评。7月13日，会议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的请示报告》。7月17日，中央批准作为中发〔1975〕16号文件转发。中央肯定“浙江省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坚决纠正前一段这方面问题的做法”。并认为浙江省委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提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7月19日，会议开始传达中央16号文件。省委认为：全省在批林批孔期间，在派性严重的头头策划带动下，以发展帮派势力为目的，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这种错误从杭州市开始，逐步蔓延全省大部地区。发展党员中采用由某些人强制党组织通过和到外单位或其他支部办理入党手续的做法，群众谓之“上督落”和“飞过海”。提拔干部不按干部管理权限审批，或由某些派头头指定，或由个别党委成员点头算数。这些做法严重违反党的章程和组织原则，带来严重后果，必须坚决纠正。作出对突击发展的党员区别对待，突击提拔的干部回原岗位，废除造反派列席党委常委会议的做法等规定。随即，会议分组揭批“双突”问题，批判张永生、翁森鹤、贺贤春、方剑文的错误，并决定分别予以处理。同时省委确定杭丝联、杭钢、杭州齿轮厂等8大厂作为纠“双突”、批派性、增团结、促生产的试点单位。8、9月份，省委以点带面，在全省形成批派性、纠“双突”、整顿党组织、恢复生产的高潮。

王洪文、纪登奎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纪登奎同志在会上的三次讲话，严厉批评了张、翁、贺等人蛮横阻挠批判派性、纠正“双突”，甚至阻挠把生产搞上去的错误，以及张永生动辄大闹省常委会，使省常委会无法正常工作等错误；同时，也严厉批评了另一派的方剑文的错误。

省委工作会议后期，认真讨论了中发〔1975〕16号文件的贯彻落实问题，揭发批判了“双突”这种严重违反党的章程和组织原则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并作出了纠正的规定：对突击发展的党员，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突击提拔的干部，回原岗位。对造反派列席党委常委会议的做法，即予废除。会议严肃批判了张、翁、贺和方剑文等人的错误。随后，省委决定：张永生、贺贤春、方剑文，分别下放农村劳动；翁森鹤，报经中央同意，依法予以拘留审查。张永生拒不服从省委决定，拒绝多次教育，还继续进行串联活动，最后报经中央批准，调离浙江，由中央组织部负责把他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对这几个派头头的处理，大快人心。

在7月至10月这段时间里，我们坚决遵照小平同志关于批判派性、整顿组织和把生产搞上去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很快收到明显效果。在省委工作会议期间，即已确定把杭丝联、杭钢、杭州齿轮箱厂等8个工